

黄埔军校生活史 1924 — 1927

邢照华 / 著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黄埔军校生活史

(1924—1927)

邢照华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埔军校生活史:1924~1927/邢照华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4

ISBN 978-7-100-09681-2

I. ①黄… II. ①邢… III. ①黄埔军校—校史—
1924~1927 IV. ①E29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3491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黄埔军校生活史

(1924—1927)

邢照华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681-2

20 年 月第 版 开本 × 1/

20 年 月北京第 次印刷 印张

定价: 元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绪 论

黄埔军校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朵奇葩，曾享有“国民革命中心”的美誉，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关于黄埔军校的研究，多年来持续得到了政府、学界和爱好者的支持。特别是近年来国内省市档案馆馆藏资料、博物馆馆藏实物、回忆录、民国要人日记、信札及苏联解密档案资料的连续出版，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更多的史料。若干难得一见的大部头资料如《黄埔军校史料汇编》，将早期黄埔军校的校刊影印，使研究者得以一睹当年的原始资料，其作用自然是可以想见的。学者们在这种背景下，不断地推进研究工作，付出了辛勤努力，也获得了不少成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黄埔军校史的研究总体上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主要在以下几个领域展开：军校创立、校长教官、学员队伍、政治教育、教学活动、东征北伐、国共合作、政权风云、将帅名人等。其中，学界对军校的创立和将帅名人两个方面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日本学者狭间直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三大政策’与黄埔军校”及陈国强在《近代史研究》上刊载的“蒋介石辞黄埔军校问题考述”等文章可为前者的代表。将帅名人研究则涉及了国共两党的主要军事将领群体，其数量相对庞大，披露内容丰富，且伴随着

口述史的进展，不乏新的发现。其他方面的研究，共识性结论较多。新近的研究成果如周兴樑先生在《中山大学学报》上发表的“苏联对孙中山黄埔办校建军的资金和军械援助”，富有新意。

近年涌现出的专著，较好地提升了黄埔军校史研究的深度。2004年曾庆榴先生的《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一书，以独特的角度探讨了前六期师生中共产党人的学习、工作和组织情况，对与黄埔军校有关的诸多大事，缕析精辟，见解独到。陈予欢的《初露锋芒 黄埔第一期生研究》、《雄美漫道——黄埔第四期生研究》等系列性专著，由宏观而入微观，对黄埔学员群体状况进行了难得细致入微的研究。2007年陈宇所著的《中国黄埔军校》探讨了军校创立、组织机构、政治教育、东征北伐及黄埔精神，是相对较为全面的军校史研究专著。其他相关的研究还有宋连生的《蒋介石的黄埔岁月》、王光远的《蒋介石在黄埔》、罗国明的《黄埔军校大传》等。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对黄埔军校历史做了七辑专题研究，汇集了一批专门学者的研究成果，达200余万字。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共出版了黄埔军校史研究性专著、史料集和工具书约70余部，发表论文约1 100篇。

既往研究成果主要倾向于政治史、战争史、人物史。本书拟略微调整研究视野，尝试选择生活史为突破口，试图以新的侧面来探讨黄埔军校的独特性。众所周知，生活史的内涵是最为丰富的，其往往有个性化鲜明的发生主体，人群指向性明确，而且又有众多生活要素的关联与交织，可供详尽的观察与解析。在生活史的视窗中，主体人物对象可以得到相对完整的聚焦和审视，主体人物的心性、行为可以得到更好的透视，由之易于牵系诸多历史事实，揭示错综复杂的关系，发现潜在的规律性，这一过程似乎可以更好地让人们触摸历史的真谛。黄埔军校孕育了黄埔人。中西合璧的黄埔军校诞生于中国社会

矛盾空前激化和民族主义激情猛烈迸发的双重背景下，推动了黄埔人奇迹般地实现了精英人格塑造和三民主义的革命实践目标。在历史的往事早已化为尘封的记忆时，浓缩在起点和终点之间、真正能够用来连缀历史的，也许只有黄埔人长留在历史星空中的道不尽的喜怒哀乐，以及期待后人解读的个性。

本书分为四个部分：①黄埔军校校园生活；②黄埔军校战地生活；③黄埔军校参与的公众生活；④黄埔军校引领的民国风尚。本书从孙中山与苏联合作入手，分析黄埔军校创办初期的情况、军校委员会的筹备和招生工作。探讨黄埔军校以实用技术为主导的军事教学工作、实训操练、校园文艺、集体演讲、民主讨论会、军人爱情、战地民众宣传、师生患难共处，以及军校师生参与地方政权建设、组建基层党部、领导民众游行、举办华侨恳亲会、慰军游艺会等诸多生活画面。黄埔军校生活的丰富内涵，在本书中得到相对集中、直观、细腻的描述和展示。透过这些展示，试图揭示黄埔军人群体在校园所经受的新理念教导和新方式训练、在军校熔炉中发生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转变，以及在革命战地生活、广东根据地社会生活氛围中激情四射的能力锻造过程。黄埔军校生活史力求从微观上显露青年志士素质塑造的动态脉象，揭示精英军人群体心迹变迁的真实历程。

本书有几点相对个性化的看法：苏联军事教育模式中国化，成为黄埔军校培育精英军事人才的重要推动力，但并不是黄埔军人素质的决定性因素。黄埔军校借助于各种集体活动实施了启发式教育，唤醒了军人的主体意识，推动了传统民族大义意识与世界革命使命的“激情式”对接，使得黄埔学员群体一直热血沸腾，活力无比。黄埔军校对学生进行三民主义的体验式灌输，又使学生视个人生命存在为主义之延续，从而表现出了从容淡定的生死观，后来转化为在战场上

的巨大能量。黄埔军人参加了大量的社会活动，与工农组织携手共进，同时，黄埔“血花剧社”又频频活跃于广州公众场所，凝聚了很高社会人气，这些都标志着黄埔军校主导的社会改造实践已经展开，反响巨大。黄埔师生还参与了不少驻地、战地的民情调查活动，并集体性地开展了捐建平民学校等相关的爱民活动，已经超越了纯军事的范畴，涉及了民生领域的内容，增添了黄埔军校研究的新内容。黄埔军校一开始就肩负着拯救国运与民生的双重任务，这种巨大的使命感必然考量着黄埔人的智慧，报国之术当然可以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因此，这一进程注定会纠结着不同政党、不同群体、不同主义之间的博弈与矛盾。

客观看来，黄埔军校提供了一个平台，一个人群聚流的舞台，一批有海外阅历的教官和国内知识青年在军校中交汇，实现了海归精英与国内精英的互动碰撞，他们意气风发，激情四射，最终开启了大手笔改造中国的尝试，打造出了独特的黄埔抗争奋斗精神。黄埔军校辉煌历史的精髓，其实就在于时代使命感呼唤下的精英素质塑造和创造行为，这正是黄埔军校魅力之所在。本书将细心梳理出黄埔军校教育体系内诸多中外糅合的体现；探索黄埔军校特有的启发、自励、实操等教育方式对人格转变的作用；考究军校育才、创业环境的规律性因素；审视社会风尚塑造的动因。黄埔办校英名播扬，军校之花多地盛开，投笔从戎风起，民国风尚为之一变。

在具体的写作中，为了本书的完整性，在绪论部分，尚需对黄埔军校的创办过程做相应的、有针对性的梳理。为了说明相关问题的关键节点，即将开始的叙述较为冗长，希望读者谅解。关于黄埔军校的筹办经过，需从孙中山、苏联及中共的三方合作讲起。自“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于1914年7月在东京建立了“中华革命党”，并

颁布《中华革命党总章》，期望以党的力量重新推动革命事业，缔造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此后连绵不断、复杂多变的国内斗争中，孙中山又经历了“护法运动”和“护国运动”的相继失败。而在此期间，传来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人民推翻了沙皇的统治、最终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令孙中山为之兴奋、鼓舞和向往。让人耳目一新的地方还在于，俄国革命建立了一个与现有资本主义体制不同的、民众可以广泛参与的新型政权——苏维埃，这也让孙中山对革命的创新形式发生了浓厚兴趣。孙中山在1918年夏致列宁的电报中表示，“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俄国存在八个月之久，这个事实给了东方人民以希望，一个类似的新的制度一定會在东方建立起来”。列宁对接到中国革命领袖的贺电很是高兴，委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格奥尔基·契切林复函孙中山表示感谢。俄国的成功让他深切体会到了一个严密的党的组织力量的强大，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又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这里的中国国民党是为了区别于民国初年由国会五党合并而成的国民党。新的中国国民党把本部设在上海，仍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并迅速在国内各地及海外华侨所在地设总支部、支部、分部。中国国民党还确定了传达改革的意愿。新的党纲为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

1920年8月28日，孙中山在接到契切林赞扬“贵国正坚定不移地前进，贵国人民自觉地走上同帝国主义对世界的沉重压迫进行斗争的道路”的公函后，在复信中，孙中山除了讨论其他问题，对学习苏联军队和教育问题，还表达了特别的意愿：“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我希望知道您和其他友人在这些事情方面、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所能告诉我们的一

切。像莫斯科一样，我希望在青年一代……明天的劳动者们的头脑中深深地打下中华民国的基础。”^a并提出了希望双方相互接触的打算。同年，俄国将军波达波夫和上校波波夫与孙中山进行了交往。波达波夫还专门将相关的军事信息函知苏俄政府外交委员契切林：“孙逸仙在海南、四川、福建等省有很大影响，在他的影响下，在这些省份和在中国其他地区，他可以发动起义并能够得到督军朋友们的支持，督军们兵合一处，为他提供一支颇为可观的武装力量。他把广州作为第一个行动目标，也就是要占领华南，他建议通过组织这次行动与北方（即北京政府）相抗衡。”^b

此后，军事合作的步伐走得越来越快。特别是1921年7月中共成立之后，中共党的组织力量也在苏俄政府与孙中山的合作中发挥了积极因素。1921年12月底，在共产党员张太雷的陪同下，苏俄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亲赴桂林拜访了孙中山。二人在桂林就俄国革命状况、帝国主义与华盛顿会议、革命的宣传和运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谈，并探讨了双方结盟议题。马林提出了三点重要建议：一是改组国民党，以便与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农民、劳工大众联合；二是谋求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三是提出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基础。^c1922年4月，苏俄外交使团成员帕依克斯从北京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员谢尔盖·达林发出任命通知和正式指示。通知谢尔盖·达林已被苏俄外交代表团授予苏俄正式全权代表身份，指示他

a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52~53页。

b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7~48页。

c 《蒋介石秘密录》第6册（日文版），1976年。转引自《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页。

尽快与孙中山建立直接联系，弄清孙中山政府的国内外政策和对外政策，以及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南方政权的作用。在随后举行的达林与南方政府的会谈中，孙中山强调其主要任务在于军事方面，必须先从军阀手中解放全中国，然后才能由革命政府着手实施土地纲领和其他革命措施。8月下旬，苏俄全权代表越飞通过马林转交给孙中山一封建立友好关系的亲笔函，双方合作继续升温。9月26日，孙中山还饶有兴致特意邀请了越飞的军事顾问——曾任俄国总参谋部学院院长的格克尔将军，与其探讨军事问题，专门嘱咐后者将自己的具体军事援助考虑向越飞转述。孙中山这一时期的具体军事合作考虑包括：①孙中山本人在南方的广东、江西、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省都有军事组织，但这些军事组织的装备很差，故请求苏俄帮助；②请俄国帮助在西北部组建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需要提供飞机、火炮、汽车和机关枪；③在西北建立俄德中三国联合公司开发矿产资源，建设铸钢厂和兵工厂，而孙中山本人也准备到新疆去，在那里建立一种新的制度，也可能是苏维埃制度。^a孙中山还提出，如果越飞自己的计划有可能实现，将派出蒋介石到北京与越飞秘商此事。

对于中国革命事业来说，引人注目的大事还有国共两党的党务进展。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等九人为中央委员。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指示，确立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明确指出，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

a 苏杭等：《绝密档案》，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100页。

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是一个比较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即使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同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特别工作是努力促成全国总工会成为一个独立的组织，使之领导和从事经济及政治的争斗。中共须努力引导劳动群众由日常生活的争斗上升到政治的争斗。“决议案”还指出，目前政治的争斗，只是国民运动——排除外力及军阀的运动，因此在劳动群众中须有大规模的国民运动的宣传。中国可以帮助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自身的组织，谨严自身的纪律，以确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首次国民党改组的会议，特邀苏联代表马林及共产党人代表陈独秀、张太雷等人出席，与会的有包括张继、王法勤、丁惟汾在内的国民党员50多人。孙中山在这次改组会议上即席解释了联俄联共政策。会议赞同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提议，并初步确定了改组计划。1922年9月6日，孙中山指定了由9人组成的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分别为：丁惟汾、茅祖权、张秋、吕志伊、田桐、陈独秀、覃振、管鹏、陈树人。稍后，因丁惟汾、田桐等4人需赴北京参加国会活动，补选叶楚傖、彭素民、孙科、刘芷芬为起草委员。历时一个半月拟就草案后，呈报孙中山审核。11月15日，孙中山再次召集由国共两党党员共同出席的国民党改组会议，对由改进案起草委员会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党纲”、“中国国民党总章”两个文件进行复核，顺利通过了该修改案。大会还推举

胡汉民、汪精卫负责起草新的“中国国民党宣言”。12月16日，孙中山亲自主持召开第三次改组会议，将修改案提交大会表决，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宣言、党纲和党章。

1923年是孙中山与苏联及中共合作取得重要进展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关于苏联军事援助计划和建立军事学校的规划基本确定。1月初，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发布指示，采纳越飞的政策建议，全力支持国民党，并建议外交人民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的代表落实这方面的工作。据此，孙中山和越飞发表了会谈纪要，即“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这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定。5月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对孙中山的南方政府给予支持，对于“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所议的具体问题进行了答复。其中，与军事直接关联的有两条：一是准备向孙中山政权提供达200万卢布的款额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这笔款应使用一年，分几次付，每次只付5万金卢布。二是准备协助孙中山利用中国北方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但物质援助数额很小，最多只能有8 000支日本步枪、15挺机枪、4门奥里萨卡炮和2辆装甲车。同时，俄国的电报特意强调：“如您同意，则可利用我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和教练员建立一个包括各兵种的内部军校（而非野战部队）。这就可以为在北部和西部的革命军队准备好举办政治和军事训练班的条件。”^a这样，不仅孙中山所期待的军事援助得以实现，而且办理军校的事情也提上议程。

孙中山于是喜出望外地作出了答复说，同意接受苏联的全部建议，将竭尽全力实现这些建议，派代表前往莫斯科以便讨论细

^a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14~415页。

节。^a1923年7月初，孙中山决定派遣代表团赴苏联。在代表团的组成人员上，孙中山本欲亲自带团前往，后因工作繁忙，只得另定他人。随即，蒋介石在香港致函孙中山大本营秘书长杨庶堪，自荐赴俄，“如欲善用弟材，唯有使弟远离中国社会，在军事上独当一方，便宜行事，而无人干预其间，则或一二成效可收……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办者^b”。7月中旬，孙中山同意由粤军参谋长蒋介石率团赴俄考察。7月26日，蒋介石与马林、汪精卫、张继、国民党本部财务部长林业明具体商定了考察团成员及行程，报请孙中山批准。这样，最终确定了由蒋介石、王登云、沈定一、张太雷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8月16日，代表团自上海起航，24日到达哈尔滨，然后换乘火车，经中东铁路于9月2日抵莫斯科。

到军校参观和讨论委托苏联为中国培养中高级军事人才，是代表团此行的部分工作。蒋介石在八天时间内参观了六所苏联军校。“九月十九日上午，马林与胡定康商谈。下午，参观步兵第二学校。九月二十日，参观军用化学学校，研究毒气之施用及防御法，并往应中国共产党青年团欢迎会。九月二十二日，往高级射击学校参观。自十五世纪以来各式枪械数百种，皆储藏于此。最新式之福德来夫骑兵用机关手枪，每次可发三十五响，且轻便异常。俄国武器之研究及进步，可与欧美各国相竞”、“九月二十七日，参观海军大学及海军学校、海军机器学校。”^c蒋介石对高级射击学校尤其“感喟不置”。蒋

a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15页。

b “与杨庶堪纵谈粤局与个人行止”，《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别录》，[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第91页。

c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36年，第13页。

介石等参观俄国陆军学校时，观看了连队、营房、红角、号令、修理部、医务室、俱乐部、图书室、机枪小队、厨房、面包房、俄共支部，而且品尝了红军战士的食品，了解了每周的食谱。蒋介石表示：“我们来这里学习并与你们联合起来。当我们回到中国人民那里时，要激发他们的战斗力，战胜中国北方的军事势力。”^a苏联的军校深深地吸引着蒋介石。于是，在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红军司令加米涅夫的高级别会谈中，蒋介石提出了可否由苏联军校为中国培养军事人才的问题，斯克良斯基回答说：“革命军事委员会认为，你们可以派一些人到苏联军事学校来学习。总参谋部可以接收3~7人，军事学校可以接收30~50人。不过，在选派到俄国来的同志时，必须遵循以下条件：首先必须是那些完全忠于党、经过仔细挑选的人。这一点特别重要。已有军龄、不低于团级或营级的指挥员，可以派到苏联的学院学习。派往军事学校学习的也需要有一定的军事素养。”“您说的很对。不过，能不能增加派出人员的数量？”蒋介石试探性地问，“开始需要进行试验。如果成立所设想的50人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那么革命军事委员会不反对增加派出人员。”^b苏联军校的建设情况，让中国军人开拓了眼界，也为日后中国创办军校发挥了借鉴作用。

广州革命政府的军校创办工作，随着苏联同孙中山政府的密切合作而加快，1923年8月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正式批准了斯大林的建议，任命政治经验极其丰富的老布尔什维克鲍罗廷同志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与加拉罕一起赴任中国的南方工作。鲍罗廷到达广州

^a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292页。

^b 苏杭、苏若群、姜弈：《绝密档案》，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162页。

后，孙中山向他提出了许多有关苏联革命和建设的问题，鲍罗廷的回答让孙中山非常赞成，二人很快就建立了良好的互信关系，孙中山将改组国民党的重大工作委托鲍罗廷指导处理。在军事建设促进方面，鲍罗廷向孙中山建议，需要成立一所专门的军官学校，培养军人并塑造一批政工干部，以实施对整个军队的改组。在以往的革命经历中，孙中山因为一直没有一支忠诚的革命党领导的军队，所以屡屡遭受挫折，这一点他有深切的体会。因此当鲍罗廷将这一问题明确为建立军校以培养革命军事人才，以便在军事管理体制和人才结构上改组现有的军队以适应革命的需要后，孙中山对新的革命军事建设的迫切性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孙中山同样把历史失败的教训归结为党不能指挥军队。他说：由于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a

1923年10月15日，国民党党务讨论会开会，议决通过了由陈安仁提出的“事项”第九号议案，“建议设陆军讲武堂于广州，训练海外本党回国之青年子弟，俾成军事人才，拥护共和案”^b。这一议案的顺利通过，显示了创办军校同样成为国民党人的共识。1923年11月19日晚，孙中山召开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了“组织中国国民党志愿师和创建军事学校”的问题。11月26日，在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的第十次会议上，孙中山提出筹建军官学校的问题。会议决定：①军校名称定为“国民革命军官学校”；②蒋介石为校长；③陈翰誉为教练长；④廖仲恺为政治部主任；⑤廖仲恺负责军校筹备工作；⑥校址定为东园。决议做了不少，但到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时，创建军校的事情仍然停留在纸

a 《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291页。

b “党务讨论会议决事项”，《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0月16日。

上。在国民党“一大”召开期间，苏联援助国民党的第一批军事顾问组到达广州，他们是波里亚克、格尔曼、捷列沙托夫、斯莫连采夫、切列潘诺夫。随着苏联军事顾问的到来，创办军事学校的问题再次提上了议事日程。1月24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邓演达、王柏龄等七人为筹备委员，并聘请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加伦为军事顾问。1月28日，孙中山指定距广州约20公里的黄埔岛为军校校址。国民党“一大”结束后，军校筹备委员会即在广州市内位于南堤的一座三层楼内设立了筹备处，开始进行具体的筹建工作。^a黄埔军校的创办是一种合力的结果。

在1924年6月的开学典礼上，孙中山等国民党要人齐聚黄埔岛，对黄埔军校抱以很高的期望。孙中山在开幕演说中庄重地声明建立黄埔军校就是为了造就一支真正的革命军。他毫不避讳地指出：“中国革命，虽然有了十三年，但是所用的军队，没有一种是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我敢讲一句话，中国在这十三年之中，没有一种军队是革命军！现在在广东同我们革命党奋斗的军队，本来不少，我都不敢说他们是革命军。他们这些军队，即使是来同我们革命党共事，为什么我还不叫他做革命军呢？我之所以不敢以革命军的名号，加之于这些军队之上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内部的分子，过于复杂，没有经过革命的训练，没有革命的基础。”^b对于黄埔军校的新使命，孙中山认为是要造就理想的革命军作为革命的基础。他殷切地呼吁到，诸君不远千里或者数千里的道路，来此校求学，既是已经明白了我们的宗旨，要造成一种革命军，一定是富有这种志愿，来做革命的事业。要做革命事业，是从什么地方做起呢？就是要从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要把

a 苏杭、苏若群、姜弈：《绝密档案》，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223页。

b 《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2006年，第292页。

自己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质，都一概革除。所以诸君要在政治上革命，便先要从自己的心中革起；自己能够在心理上革命，将来在政治上的革命，便有希望可以成功。如果自己不能在心理上革命，就是此刻在这样设备完全的军官学校之内，研究军事学，将来还是不能成革命军，做革命军的事业。所以诸君要革命，便先要立革命的志气，此时有了革命的志气，将来便可以当革命军的将领。我们要把革命做成功，便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地来革命，才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孙中山还就办校与俄国的关系说到，俄国在六年之前，一经发动革命，便同时组织革命军，所以能够消灭旧党和外来的敌人，大告成功；我们现在开办这个学校，就是仿效俄国。中国革命，有了十三年，到今天还要办这种学校，组织革命军，可见大凡建设一个新国家，革命军是万不可少的。^a

黄埔军校承载着孙中山的重托，随后就开始了艰苦的磨砺建设，悉心培养革命军人，打造革命的军队，导向革命的目标。在黄埔军人成长历程中，他们还承担了保卫革命政府的济危任务和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庄重使命。战火让战士的心愿和梦想飞扬，战场倾注了革命青年的爱与恨，战争的洗礼最终锻造出了孙中山先生期待已久的一支刚强的革命军。不过，伟人的长逝也带来了巨大遗憾，当孙中山的慈容最后定格在历史长河中的时候，一代伟人的双目似乎还在冥冥中远送着他的军队，中华民族的统一之旅却在匆匆走近。

在后来波澜壮阔的风浪中，黄埔军人致力打造革命军，不负孙中山的期待，为民族革命作出了贡献。在日本防卫厅研究所编纂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一书中，当时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曾

^a 《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2006年，第293、第297页。